



世纪前沿

Culture and Resistance
Conversations with Edward W. Said

[美] 爱德华·萨义德 戴维·巴萨米安 著 Edward W. Said David Barsamian

梁永安 译

文化与抵抗

萨义德访谈录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第 1 卷 第 1 期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卷 1 第 1 期

ISSN 1674-2222 (Print) / ISSN 1674-2230 (Online) / DOI: 10.1007/s11861-013-9100-0

第 1 卷 第 1 期

文化与抵抗

萨义德讲读录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文化与抵抗

萨义德访谈录

[美] 爱德华·萨义德 戴维·巴萨米安 著 梁永安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抵抗: 萨义德访谈录/(美)萨义德(Said, E. W.),
(美) 巴萨米安 (Barsamian, D.) 著; 梁永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5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书名原文: Culture and Resistance: Conversations
with Edward W. Said

ISBN 978 - 7 - 5327 - 4667 - 5

I. 文… II. ①萨…②巴…③梁… III. 萨义德, E. W.
(1935~2003)—访谈录 IV. K837. 12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9762 号

图字:09 - 2008 - 027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 - 56135113

责任编辑 张吉人

装帧设计 陆智昌

文化与抵抗

——萨义德访谈录

[美] 爱德华·萨义德 戴维·巴萨米安 著 梁永安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yiwen.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10.75

插 页 4

字 数 100 000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7 - 4667 - 5/D · 096

定 价 20.00 元

导论

“我无法过一种没有担当或悬浮的生活，我不迟疑于公开表白我对一个极不热门的政治追求的亲附。”萨义德写道。^[1]

一九六七年的以阿战争激起了他的政治热忱。一年后，他的第一篇政治论文《被定型的阿拉伯人》(The Arab Portrayed)面世了。一九六九年，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Golda Meir)一番恶名昭彰的话惹恼了萨义德：“看来没有巴勒斯坦人这回事……他们并不存在。”他毅然决定“接下这个微微荒谬的挑战，也就是去否认她，去清楚说出一段有关丧失与剥夺的历史。这是一段必须解救出来的历史——一分钟一分钟、一个字一个字、一英寸一英寸地解救”。^[2]

自此多年以来，他一直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在美国的主要代言人。

“为巴勒斯坦人说话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你得到的回报只是羞辱、谩骂和排斥……我有多少朋友避谈这个话题？我有多少同事不愿卷入巴勒斯坦的争论？又有多少自由派人士有时间为波斯尼亚、车臣、索马里、卢旺达、南非、尼加拉瓜或越南的人权和民权请命，却置巴勒斯坦和

[1] Edward W. Said, “Between World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0: 9 (May 7, 1998) See also Edward W. Said, *Out of Place: A Memoir* (New York: Knopf, 2000).

[2] Edward W. Said, “The Arab Portrayed,” in Ibrahim Abu-Lughod, ed., *The Arab-Israeli Confrontation of June 1967: An Arab Perspectiv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9. See also Said, “Between Worlds,” and Noam Chomsky, *Fateful Triangle: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updated ed.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1999), p. 51.

巴勒斯坦人于不顾？”^[1]

他就巴勒斯坦问题所作的高分贝发言让他付出了不少代价。他被污蔑为“散播恐怖的教授”。犹太人防卫联盟（Jewish Defense League）称他为纳粹。他位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被纵火。他与家人都“收到数不胜数的死亡恐吓”。^[2]

超过十年时间，萨义德都是巴勒斯坦国民议会（Palestine National Council, PNC）的一员，但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却对他怒气十足。这不但是因为他主张“以色列犹太人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平共存的理念”，也是因为他认识到“不存在军事选项”。他写道：“我对‘武装斗争’的观念非常不以为然，因为这种革命冒进主义只会导致无辜的平民死亡，无助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改善。”^[3]

自一九九一年退出巴勒斯坦国民议会后，萨义德成为阿拉法特和所谓的“和平进程”的主要批判者之一。当“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于一九九三年十月在白宫的南草坪签订以来，他是一片乐观气氛中的罕有反对声音。他一眼就看穿“奥斯陆协议”的底细，并称之为“一纸巴勒斯坦的凡尔赛和约”（a Palestinian Versailles）^[4]。

“克林顿就像个罗马皇帝一样，把两个附庸国的国王拉在一起，让他们握手言和。”他这样告诉我。^[5]

与这种政治积极主义齐头并进的是他对人文学（humanities）的巨大贡献。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他教我们看穿文学对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和中东的再现方式。他也揭发出知识怎样被用来合法化和维护权力。《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出版

[1] Edward W. Said, “Cherish the Man’s Courage,” in Eqbal Ahmad, *Eqbal Ahmad: Confronting Empire*, interviews with David Barsamian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2000), p. xxviii.

[2] Said, “Between Worlds.”

[3] Said, “Between Worlds.”

[4] Edward W. Said, “A Palestinian Versailles,” *The Progressive* 57:12 (December 1993): 22–26.

[5] Edward W. Said, Interview with David Barsamian, *The Progressive* 63:4 (April 1999).

于一九九三年，它与《东方主义》并为萨义德重大文化研究工作的双璧。

奇怪的是，尽管工作繁忙，但这位“文艺复兴人”（Renaissance man）还是抽得出时间来弹钢琴和撰写音乐与歌剧方面的评论。他受到赛泽尔（Aimé Césaire）的一首诗的启迪，并喜欢引用它：

但人的工作才刚开始，
 还有待人去征服
 所有隐藏在他激情暗处的力量。
 没有种族能独占
 美、智与力，
 而在胜利的集合点上
 所有种族都会有一席之地。^[1]

不经意地，诗歌在我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帮了我一个大忙。我们在他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见面，而我有一点点紧张。他一开始就问我不是准备了“好问题”，这只能让我的紧张有增无减。一直到我提到当代巴勒斯坦大诗人达维希（Mahmoud Darwish）的一首两行诗，我们的谈话才开始热络起来。接下来的那些年，我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访谈，最后汇整成为《笔与剑》（*The Pen and the Sword*）一书，由共同勇气出版社在一九九四年出版。

要用笔墨形容萨义德的巨大活力、知性激发性和热忱是很困难的。他喜欢透过谈话交换意见。读者也许会有兴趣知道，他在接受访谈时都是随问随答的。我们没有事先彩排，问题也没有经他事先过目。

[1] Aimé Césaire, “At the Rendezvous of Victory,” trans. C. L. R. James, quoted in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Knopf, 1993), p. 280. Edward W. Said, “A Palestinian Versailles,” 22–26. David Barsamian, Interview with Edward W. Said, *The Progressive* 63:4 (April 1999): 34–38.

自一九九〇年代初期，萨义德就为了对抗白血病而战。他进进出出医院，周而复始地接受治疗。在这中间，他尽力写作和讲学。他的敌人希望他闭嘴，但诚如他在本书的其中一篇访谈里说的：“除非我死掉，否则这种事不可能发生。”^[1]

巴萨米安 (David Barsamian)

[1] See p. 82.

目录

导论 / 1

第一章 单一国家方案 / 1

第二章 二〇〇〇抵抗运动：巴勒斯坦人的起义 / 21

第三章 他们希望的是我闭嘴 / 50

第四章 恐怖主义的根源 / 73

第五章 以巴勒斯坦人的观点看以巴冲突 / 93

第六章 在胜利的集合点 / 111

第一章

单一国家方案

一九九九年二月八日

科罗拉多州，博尔德，KGNU 电台

· 阿拉法特 (Yasir Arafat) 的健康明显欠佳。他会抖，形容憔悴。你对他的健康状况有所了解吗？

上星期我相当凑巧遇到阿拉法特的一个忠实追随者（我们坐同一班机），他告诉我阿拉法特的健康好得不得了，只是有一点点抖，如此而已。但其他人却相信他得了帕金森症，一个住在加沙地带、不久前见过他的医生也是这种看法。不管怎样，过去一年来见过阿拉法特而又跟我谈过话的人都表示，他的灵活性和警觉性都大不如前。所以我怀疑帕金森症之说是真的。尽管如此，他仍然抓住一切不放。大至国家文件小至下属请假单都要经过他签署。任何事情都要先经过他的办公桌。他仍然是个鸡毛蒜皮都管的总经理 (micromanager)。他的大部分下属（包括他的部长）都有怨言，却没能力改变什么。

我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大多数人都忽略的：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地区内最大的一名雇主。除了臃肿的官僚体系以外，他的安全卫队

人数高达四万。^[1] 这是非常没有生产性的经济部门。除此以外，拜他的消费习惯所赐，自治政府对任何下层建设毫无认真的投资。所以，依我所见，巴勒斯坦现在的状况是死水一摊，一天比一天坏，而这主要是归咎于他的统治方法。他关心的只是抓牢权力，确保没有对手挑战他的地位或政治结构发生任何改变。就像约旦的统治者一样，他的权力大部分都是以色列和美国所授予的。

主流媒体完全知觉不到有什么正在发生着

· 你的书从前在阿拉法特统治的地区被禁。现在还这样吗？

确实情况很难知道。你可以买得到它们。它们偷偷摸摸在流通。在一个电子邮件、影印和传真大行其道的时代，没有什么是真的禁得了的。一年前我在那里的时候，被一个杂货店老板认出（他也卖书）。他告诉我：“我有卖你的书，但都是放在柜台下面，以防有‘民族权力机构’^[2]的人经过看到。”那是在希伯伦市（Hebron）。更讽刺稀奇的是，在我的书被禁的一年后，我收到资讯部长拉布的（Yasir Abed Rabbo）——禁书令就是他签署的——一封信，想征得我的同意，让他们可以在约旦河西岸出版我的书。^[3] 我当然不同意。

· 以色列的情况怎样？

[1] Barton Gellman, "Netanyahu, Arafat Sign Accord,"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4, 1998, p. A1.

[2] 指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即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译者

[3]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Palestinian Lawmaker Condemns Book Ban," August 23, 1996.

可以买得到。

· 其他阿拉伯国家呢？

视情况而定。我没做过调查。在埃及和黎巴嫩几乎都可以买到。我听说我的一些书在约旦被禁而另一些在不同的波斯湾国家被禁。但这是每一个作家都会碰到的事。那些国家行的是独裁统治和君主专制，做什么事全凭一时高兴。哪个当政者看不顺眼什么，就会说：“我们不应该让它流通。”于是那东西就被禁掉了。他们有时也会禁掉某一期的杂志或某一天的报纸。所以情况是完全没有一定的。但我从黎巴嫩那里的出版商得知，在一些较大的波斯湾国家，例如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阿拉伯文译本是被禁的。我想摩洛哥和突尼斯也是同样情形。阿尔及利亚的情形我不得而知，但我不认为他们目前有进口很多书。

· 自一九九三年十月“奥斯陆协议”签订以来，你对所谓的“和平进程”的批判就没有停过。多年以来，主流媒体——至少是美国的主流媒体——都蓄意忽略你。不过，最近你的曝光度却大大增加。《新闻周刊》、《纽约时报》、全国公共电台、公共电视网都看得到你或你的文章。这意味着什么？

我想这并不只是因为我的批判奏效，而是有许多人现在已看出事实的真相。我们刚才谈到审查制度，而美国这里也有一种变相的审查制度，那就是把你边缘化。你上不了主流媒体。但现在的情形却稍微有点不同，人们可以从网络上读到你发表在别处的东西——比方说我发表在阿拉伯国家报章的文章。《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之所以会邀我写一篇东西，谈我为解决以巴问题而提的双民族国家（binational state）构想，就是因为他们有人在网络上看过我的文

章。^[1] 它的主编打电话给我。他说，事情已经很清楚，不只和平进程行不通，犹太复国主义也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样，他们想寻求一些新的见解。不过，我不认为这代表美国媒体真有什么洗心革面的改变，而只不过表示他们愿意朝旁边瞄一眼：他们想要显得有包容性，所以把我也包纳进去。这一点，只要看看一般媒体对最近一连串事件——比方说和平进程在“怀伊协定”（Wye agreement）后的冻结、以色列大选的逼近和约旦国王侯赛因之死等等——说了些什么就一清二楚。全都是老调重弹，同样一套刻板印象，同样一套旧的论述。那是一个不动如山的系统，完全不受事实或真相的触动。这是很让人错愕的。主流媒体完全知觉不到有什么正在发生。我还记得有一次应邀上公共电视网的《查理·罗斯秀》（*The Charlie Rose Show*）。^[2] 罗斯反复要向我灌输老掉牙的观点，不让我把任何一句话说完。我要说的话太惹人生气了，他不允许我说出来。

公民权的标准不应该以种族为依归

· 为什么现在你要呼吁建立一个双民族的国家？

自从一九四七年底离开巴勒斯坦以后，近年来是我人生第一次会定期到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以色列走走。去年我去了五次。我去得愈多，对一个事实的印象就愈深刻：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的人口分布是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的。这是第一件会让你震惊的事。以色列人是筑路狂。他们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筑了很多路，但这些路是刻意避开巴勒斯坦人的城镇和村庄的。尽管如此，这个地方太小了，巴勒斯坦人和

[1] Edward W. Said, "The One-State Solutio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10, 1999, p. 6: 36-39.

[2] Interview with Edward W. Said, *The Charlie Rose Show*, WNET-TV, June 6, 1996.

以色列人是不可能完全不相往来的。其次，许多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雇去建筑和扩大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屯垦区。这真是最大的讽刺之一。另外，也有些巴勒斯坦人在特拉维夫、西耶路撒冷和海法打工讨生活，例如当餐厅侍者等。约旦河西岸的情形也是一样。希伯伦之类的城市看得见屯垦者，更不用说是耶路撒冷及其周遭地区，其中包括贝特哈尼纳（Beit Hanina）这样的巴勒斯坦人大镇——它过去从不是耶路撒冷的一部分，但现在却成了耶路撒冷市界的一部分。所以，不管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互动有多么冷漠和带有敌意，他们都是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这个事实，不是你把人们推到另一条边界后面或另一个国家而可以改变的。打从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开始，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就已牵扯在一起。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意味着必须采取某种安排，让人们可以和平生活在一起。和平，是不可能透过隔离实现的。

另一个我想也很重要的因素是，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年轻一代巴勒斯坦人的态度，他们的领袖是国会议员毕夏拉（Azmi Bishara）。他们一直跟以色列的犹太人住在一块，但身份却有如二等公民——有时甚至如同非公民，因为他们没有迁移或拥有土地的权利。他们强烈意识到了自己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正为民权和公民权而斗争。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受到世俗化以色列人的非公开的支持。这些以色列人相当忧心教士阶层的权力过大、法律会愈来愈有宗教取向，以及正统派的力量会压过保守派和改革运动。这一切汇聚为一种重要的舆论（美国媒体对此又是只字不提），人们开始谈到制宪的问题（以色列是没有宪法的），谈到公民权的标准不应该以种族为依归，应该让阿拉伯人拥有全面的公民权。这种发展趋势让我非常动容。我跟这两边的人都谈过话，有分别谈的，有一起谈的。这是一个错不了的思想趋势。

第四个让我有此想法的因素是人口学上的现实。到了二〇一〇年，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人口就会势均力敌^[1]。我谈的不是全世界的巴

[1] See Meron Benvenisti, "The Return of the Refugees Won't Tip the Scales," *Ha'aretz*, July 8, 1999.

勒斯坦人或全世界的犹太人。我谈的只是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情况。那地方太小了。南非要比以色列大二十倍，却仍然维持不了种族隔离政策。以色列是四边被阿拉伯国家包围的，到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的人口旗鼓相当之后，它更不可能把一种实际跟种族隔离无异的政策维持下去。如果你把中东地区其他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加进来，人数更是大大超过以色列。

把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让我认为除了建立一个双民族的单一国家以外，没有别的选择。当然，这个目标要能实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目前看来犹如一种乌托邦——有些人甚至会认为是狂想。但只有这个奠基于平等愿景的构想能让人们活下去，而不是一心想着把对方消灭。我努力去激起人们讨论和反省，看看有哪些办法可以让这样的国家诞生或存活。

让我们以他们的存在而不是他们的不存在思考他们

· 你的包容主张和“单一国家”方案，跟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的一个旧流派是呼应的。

就像许多巴勒斯坦人一样，我也读过以往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内部争论。我在这里是最宽广的意义来使用“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词的。他们中间有些人相当有器量，比方说布伯（Martin Buber）、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希伯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马格内斯（Judah Magnes）。他们明白，如果把侵略性的屯垦政策一意孤行下去而罔顾阿拉伯人的感受，双方的冲突在所难免。就连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1]也说过，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民族会自己拱手相让，任由另一

[1]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以色列的主要缔造者和首任总理。——译者

个民族把他们的土地抢走。^[1] 所以犹太复国主义者早知道冲突在所难免。马格内斯特别意识到这一点，他事实上是个理想主义者。

读他的东西愈多，思索他的话愈多，你愈会发现他是走在时代前头的，是颗不平凡的心灵。有意思的是，他是个美国人。他说：“让我们用更道德和更深刻的方式思考阿拉伯人问题。让我们以他们的存在而不是他们的不存在思考他们。”我发现，这种精神或明或暗也见于新一代以色列历史学家的作品中。他们耙梳各种历史资料和档案文件，重新检视了以色列的国族论述，发现它的独立和解放神话是奠基于对阿拉伯人存在的否定、擦拭或顽固的回避。^[2] 以色列过去五十年来所做的事当然不是为了寻求安全。没有安全是这个样子的。以色列一直努力要维持一种隔离阿拉伯人的政策，但这种政策总有行不通的一天，这一方面是因为人口学上的趋势，另一方面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巴勒斯坦人愈挨揍愈不肯屈服。他们甚至愈来愈决绝和顽强了。

所以那是一种清新的舆论，是从犹太复国主义内部产生的。我无意去否定它或批判它。但要知道它基本上是犹太人内部的辩论，而不是发生在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布伯、阿伦特和马格内斯这些人确实想要照顾巴勒斯坦人的需要，可惜事情最后却朝两极化的方向走，这是因为英国人满肚子权谋，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领导班子——卡曾尔森（Berl Katznelson）、本-古里安和魏兹曼（Chaim Weizmann）^[3] 之流——又都是相当聪明的政客，让马格内斯这些个人——他们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些个人——一点赢的机会都没有。那是个相当有局限性的辩论，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太高估其重要性。

[1] See Simha Slapan, *Zionism and the Palestinians* (London: Croom and Helm, 1979), p. 143.

[2] See, among other works, Benny Morris, *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1947-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Avi Shlaim, *Collusion Across the Jordan: King Abdullah,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Partition of Palest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and Ilan Pappé, *The Making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1947-1951* (London: I. B. Taurus, 1992).

[3]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领导人，以色列首任总统。——译者

我想，像我这一类有幸不用住在以色列或巴勒斯坦，不用面对日复一日压力而可以站在一定距离外反省的人，该做的是引发讨论和辩论，把敌对阵营的成员也引进讨论之中。这种事情或多或少已经开始发生。现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知识分子经常会对话，经常会举行会议，但他们的讨论不像过去那样，是着眼于政府的方式解决问题，类似和平进程的一种附属品。那一类的讨论过去已经相当多，但都一事无成。现在的则是一种全新的讨论，赖以奠基的是耐心的学术研究、仔细的档案文件耙梳工作。它不是由有政治野心的人所发起。它主要是学术性的，参与者是些远离主流政治而在学术界和知识分子圈拥有一定地位的人。这是一个相当新的现象。我不认为媒体对这方面有足够的关注，它们都是一心一意盯着迈向失败的和平进程的动向。

以色列本土有20%左右的公民是巴勒斯坦人。^[1]一九九八年底，你曾经有机会在你母亲的出生地拿撒勒（Nazareth）跟他们其中一些人谈话。但你们谈话的场地有个匪夷所思的名字叫“弗兰克·辛纳特拉堂”（Frank Sinatra Hall）。

那是弗兰克·辛纳特拉捐钱盖的，他是以色列的大力支持者。我想那是一九七〇年代的事。他被说服，在拿撒勒盖一座场馆。拿撒勒是一个以阿拉伯人占大多数的城镇，但也住着些犹太人，主要是住在拿撒勒上城区。其原初构想是盖一个运动场地，供阿拉伯人和犹太少年一起打篮球。虽然场地盖好了，但显然没有能发挥作用。后来它被以色列总工会（Histadrut）所接收。经过一段时间，它成为一个出租的场地。你可以租它来开晚会或举行什么活动。我注意到，那地方除了有个大礼堂，还有一家咖啡馆、一家酒吧和一个撞球场，是人们聚会的好地方。

[1] See Martin Sieff, "The Israeli Arabs-A Ticking Time Bomb,"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October 2, 2000.